

军队大脑

〔苏B·M·沙波

军事科学院外国

解放军出版社

МОЗГ АРМИИ

Б·М·ШАПОШНИКОВ

根据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局1982年版本译出

军队大脑

〔苏〕Б·М·沙波什尼科夫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13万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065-0031-0/E·18

统一书号: 5185,140 定价: 2.00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关于总参谋长的几点想法	(1)
二、“一切质量取决于它”.....	(17)
三、对内政策与总参谋部	(39)
四、经济与战争	(56)
五、对外政策与战争	(84)
六、战争计划与对外政策	(131)
七、动员是战争的序幕	(172)
八、联盟战争	(196)

一、关于总参谋长的几点想法

……回过头来谈谈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初步研究当然不可能包罗一切，但所得印象可使我们对他作出某种评价。

我们把总参谋长看作是一位“统帅”，但不是老观念中的那种统帅，而是一位“国务活动家”，是指导战争的“集体”成员之一……我们绝对无意让指导战争的首脑机关中的“统帅”“完全自由行事”。

应当说，在我们的军事文献中，对这一问题已有相当明晰的见解。A·斯韦钦在《战略》^①一书中谈及“统帅集体”时得出结论说：“战争是由国家最高当局实施的。指导战争的首脑机关要作出的决定意义太重要，责任太重大，因而不能将战争指导工作托付给执行机关的代表。

他还说：“由于使用‘最高总司令’这一术语，我们关于首脑机关的概念被歪曲了。我们常常把首脑机关与负责指挥陆海军作战军队和统一掌握战区全部权力的人混为一谈。实际上这种总司令并不是最高的，因为内政外交和作战军队的整个后方并不归他指挥，他也不掌管整个国家的

^① A·A·斯韦钦：《战略》，国家军事出版社1926年莫斯科版。

全部权力。负责战略的总司令只是指导战争的首脑机关的一个部分……一切权力归被推选出来的统帅！——这个公式早已过时，而且从未反映过实际存在的情况”。

A·斯韦钦承认有必要统一指导“政治、经济和武装斗争”各条战线上的战争，但是，他认为“只有统治阶级中以最高政治权力化身出现并行使最高权力的首脑人物才能胜任此项任务……而首脑人物组成的集体即为统帅集体”。

我们曾听到一种说法：因为克劳塞维茨把总司令看作“统帅”时也没有用“最高”这个修饰语，所以我们才把总参谋长看作“是只代表战争指导机关一部分的，负责战略的总司令”。

理论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统帅的智慧和性格必须平衡，而且两者均应十分出色，使他能超过其他的军事家。

毫无疑问，康拉德不仅在奥匈帝国军队的将领之中，而且在欧洲其他军队总参谋长之中，都是才智过人的。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看法，统帅在才智方面应当是具有钻研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是有创造精神和单方面发展的人。这是才智的第一个特性，即钻研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康拉德是具有这种精神的，至于在才智的全面发展方面，这位奥地利总参谋长对军事现象的判断力是比较可靠的，但他的政治预测能力显然高不过多瑙河帝国的其他官吏。从这方面讲，康拉德的才智确实属于“单方面发展”，

与他所居高位不甚相称。

康拉德从青年时代起便努力钻研军事。他广泛熟悉最近历次战争的历史，遍访作战现场，从这些战争中吸取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对战争进行长时间的思考，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这位奥匈帝国总参谋长智力的发展。不能说康拉德理解并预见到了未来世界大战的性质，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这方面他尚未达到统帅应有的气魄。但是与其他军队总参谋长相比，他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

康拉德也不得不向我们承认，他是被勉强地卷入政治生涯的，事先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末培养军事家的方法所产生的合乎自然的结果，这种方法当时又为毛奇的观点所充实。但是，一旦走上政治的道路，康拉德是勇往直前的，他发表的各种见解表明他具备一位著名德国陆军元帅应有的思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康拉德看来，政治依然与战略没有分开，因此，这位总参谋长一心向往的仍然是消除政治的影响。接到上级关于要联系政治开展工作（他自己也反复讲这一点）的指示时，康拉德实际上总力图奉行他认为是最符合国家军事形势的独立的政策。

我们无法证明，这位奥地利总参谋长的政治观点正确地反映了奥匈帝国的“国家生活、主导方向、被损害的利益和迫切的问题”以及它与别国的“国家关系”。他的政治

观点不会高于一位虔诚的君主主义者的观点。而作为一名虔诚的君主主义者，他在内政方面曾以好走极端著称，连弗朗茨·约瑟夫^①都感到害怕，他逞强好斗的精神使奥地利国内外一切政治家都大感惶恐。康拉德与毛奇一样，把毕生精力集中于战争与军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对这两位军国主义者是格格不入的。虽然这位奥地利总参谋长自己也承认在政治上相当无知，可是我们仍不能以此为其开脱，因为战争哲学家^②虽不要求统帅具备渊博的学问，却要求他有正确的政治嗅觉。康拉德缺乏这种气质，所以他在政治见解上充当了右翼政党的应声虫，而不象是统帅应成为的那样的真正的国务活动家。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要求康拉德做到这一点，因为按三人执政制度规点，政治生活不是由统帅，而是由外交大臣或部长，或由君王本人代表的。作为毛奇的信徒，康拉德忠实地遵循着毛奇关于三人执政制度的学说，他对三人执政的解释也与德国陆军元帅一样。在康拉德阐述的三人执政制背后，隐藏着军事控制政治的权力思想。我们看到，从毛奇开始，所有德国派理论家，向我们推销的都是这种

①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1867年他将奥地利帝国改组为两位一体的君主国——奥匈帝国。1879与德国订立条约，后该条约成为三国国盟的基础。他在巴尔干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对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② 此处指克劳塞维茨。——译者注

统帅威力无比的思想，只有克劳塞维茨比他们高超，他承认对战争的集体指挥机关，而把君主作为顺利进行战争的必要象征。他只要求君主具有“坚定而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性格”。

无需多说，作为一种指挥战争的体系，三人执政制度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已彻底破产。在大战期间，一种指导战争的“集体”已登上舞台。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战争哲学家也给总司令在这个指导“集体”中的职能下了定义。克劳塞维茨一方面认为统帅应当成为“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仍然首先不失为一个“统帅”，即军事家。他的工作应注重认识战争的军事本质，同时不忽视战争的其他方面。克劳塞维茨的后代——来自施普累河地区的德国人及其后的康拉德在阐述上述原则时把它发展为实施战争过程中要实行军事上的独裁，这种思想遭到明显失败，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这几位“总参谋部的大人物”因对战争的高级领域缺乏真正的认识，结果为此而丢掉了脑袋。

A·斯韦钦在《战略》一书中解释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时写道：某些国家属于已处于历史上的防御地位的垂危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的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它不得不奉行一种不健康的政策，牺牲整体的利益以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在这些国家中，政治控制战略的做法……经常引起人们的怀疑……十分自然，战略就会力争摆脱腐败的政治，

可是脱离开政治，战略又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结果，战略注定要为政治的一切过失付出代价”。

按照这位作者的看法，具有广阔未来的年轻阶级，其历史健康状况亦反映于它所追求的健康政策之中，当这个阶级成为政策的制定者时，“政治控制战略”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

“健康的政治”产生“健康的战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摆脱”这种政治却另有原因。以1870年的战争为例，无可否认，俾斯麦实行的是“健康的政策”，战争推动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德国在争取统一方面也算是一个较为“年轻的阶级”。可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毛奇是力图摆脱这种在他看来是一种“病态的”政治的，并且对战略家不得不处处考虑政治表示十分“遗憾”。我们说，总参谋部只把“它自己的”政策而不是任何别的政策视作唯一“健康的”政策，它要求的是政治服从战略，并认为如莱瓦尔^①所说，一切“政治对战略来说都是一种鸦片”，我想，我们这种说法是与真实情况相去不远的。

资产阶级国家现在处于“历史上的防御”地位，它们是一时一刻也不愿将政策交给战略家去处理的，它们不会让总参谋部开阔自己的世界观，即使总参谋部以“超级总

① 莱瓦尔·瑞里·鲁易（1823—1908）——法国军事理论家，将军。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论证了必须在经验、统计和物质潜力的基础上建立军事科学的问题。他错误地认为，战略不以政治为转移。

参谋部”的名义去争取保持其原有阵地，也只能是它作出的最后努力罢了。

综上所述，十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把康拉德这位毛奇理论的崇拜者列入一位统帅所应列入的“政治家”名单之中。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这位总参谋长的军事知识。如前所述，他年复一年地研究军事历史，依靠自己有限的战斗经验及较长时期的军队生涯，力图认清现代战争的实质。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那种渴求理解整个未来战争的性质，竭力探求实施战争和战斗的新方法的钻研精神。

康拉德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检验从书本中学得的知识并得出必要的结论，他握笔著文捍卫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军事学院的讲台宣传这些观点。通过上述种种途径，康拉德不仅力图扩充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且力求将这些知识传播到军队中去。换句话说，他在训练一支“自己的私人军队”。

总参谋长能否胜任此项任务？这又当别论。

从我们所列举的康拉德关于战争、关于国家对战争的指导、关于现代军队的战斗训练以及要正确指挥军队必须了解军队等问题的观点中可以得到证明，他是一位具有渊博理论知识的军事家……他的某些观点至今仍不失其新颖现实之优点。

鉴于这一原因，我们比较同意鲁登道夫及其同代人的

看法。他们认为这位前奥地利总参谋长在军事方面知识相当渊博，而不太同意克劳斯^①的意见，他认为康拉德只是一位思路狭窄的战术家。

康拉德曾讲授过战术，后又在军队服役，这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毋需多说的，他确曾十分热心地研究过战斗的战术内容，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正确的战略思想。战术和高级的战略思想一样，也应当为统帅所通晓。当我们聆听莱瓦尔热烈地传播其实证战略时，我们想，一位统帅如能熟悉军事“几何学”——战术，决不会是无益的。

康拉德坚决主张并广为宣扬采用实用方法研究军事，但他更侧重于培养军事活动的知识，而不是军事家的性格。从这方面讲，这位奥地利总参谋长不仅未能克服，而且可以说是进一步加深了当时在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以损害坚强意志和性格的训练去广泛培养军事知识的倾向，毫无疑问，他在理论上是承认培养意志和性格的必要性的，而且实用研究法本身原本应当为此而服务，可是，要改变军队中业已形成的制度也十分困难。康拉德也随波逐流了……

不管多瑙河帝国总参谋长如何信仰德国的军事思想，也不管他多么敬崇德国军事思想的著名权威，从他过分注重军事知识这一点讲，我们有理由将他列入莱茵河以西到

① 克劳斯——奥匈帝国军队上校，曾任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

处盛行的“唯智论者”之中。

A·斯韦钦形象地把康拉德比作“头重脚轻”的学者，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他亲身的战斗经验不多，已有的一点经验也是在担任较低职务时获得的。康拉德据以借鉴并步步高升，当上统帅的全部战斗资历就是两次规模不大的远征。他掌握战争高级知识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战争范例，这位总参谋长也确是效法这些战例，因而免不了要热衷于对科学性的研究。当然，有了战斗经验并不等于有了一切，德拉戈米罗夫在1867年形容毛奇时是这样说的：毛奇将军属于那种坚强的、几乎以军事理论研究代替实战的罕见的人物。没有实践，照样可以正确地理解战争的实质，照样会打仗，而且可以打胜仗。康拉德的许多同龄人如鲁登道夫还不如康拉德，可他们照样打胜仗，所以我们绝对无意将战争经验列为统帅必具之条件，但是，我们认为战争经验是有益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掌握从书本上研究战争这类现象的方向。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要想在认识战争的高级内容时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其所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但是，这些方法毕竟不是法定他必须采用的。

无论从康拉德的理论原理中，还是从他的推理论述中都可以看到，现代的统帅应“熟悉军队”，甚至“创立军队”。这种认识当然不是建立在单纯地接近军队这一基础之上，他获得这一认识是因为（1）他曾直接在作战部队服

役，（2）他亲自巡视和校阅过军队，指导过多次大演习。我们曾指出过，到部队服役应成为可能担任总参谋长职务的军官晋升的必经阶段。康拉德曾自豪地谈到，他因长期在作战部队服役，所以有可能对哈布斯堡的军队进行研究。不过，克劳斯和康拉德的其他同代人却证实说，康拉德缺乏的正是对战争工具的这种认识，因为他的一切构思完美的作战意图首先就是在自己的军队中遭到了碰壁。这位总参谋长本人在理论上就曾要求，提出的意图要与军队的实力相适应，可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违反了这一要求，在进行战争问题上迷恋于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说一位统帅必须使提出的目的与手段相适应，那么，我们很难看出康拉德具有使他成为伟大人物的品质。

克劳塞维茨指出，“不必要求他（统帅）成为能洞察人的性格的一切细枝末节的了不起的观察家，但他应当了解属下的性格脾气、思想方法和优缺点”，另一些理论家赞同这一观点并增加一条要求，即必须对敌方领袖的性格也有所了解。根据这位原奥地利总参谋长同代人的看法，他因对人的了解不够，因此曾对他所提拔的接班人在战场上极不称职而痛苦地感到失望……康拉德对人的评价受个人好恶、关系亲疏的影响非浅。这一方面是他的个性特点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和象多瑙河帝国的那种军队上层中普遍存在着腐败的作风。如果说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只要求统帅了解部属适于军事活动的那

些主要品质，而不是他们的小节，那么，康拉德却更多地注意人在小节方面的品德，而不是看其基本优点，对人的弱点持宽容态度。

至此，我们已探讨了原奥地利总参谋长的智力发展情况，但是，有了才智并不等于有了当统帅的特许证，因为一个统帅还必须具备坚强的性格。理论对统帅提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必须具有干劲、坚定、自信、勇气和刚强等品质。

在熟悉这位原奥地利总参谋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在发表见解和实际行动中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他自己也谈到过工作要有干劲和主动精神，这也是他本人的特点。康拉德无论是向部属作报告还是向他们提出要求，一贯很严厉，他在性格上具有必要的勇气和刚强，但这种勇气往往又束缚了他的自由思考和想象力。康拉德担任公职时“不停地战斗”，他如此地迷恋于这种战斗本身，以致甘愿为作战艺术拼搏，而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位总参谋长满脑子“威镇众人”的思想，甚至有些病态，只有在哈布斯堡面前这位忠实的奴仆才肯叩首屈膝，忍受给他的自尊心带来的伤害……

上述一切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性格倔强而坚定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易激动和固执的人。康拉德易激动和固执的特点相当突出，有时使他的才智也黯然失色，为感情所左右。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容易激动的”人，

而不是克劳塞维茨所要求于真正统帅的那种“头脑冷静”的人。

这位前总参谋长信奉毛奇学说，不怕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他显然同德国陆军元帅一样，认为自己只“对上帝和自己的良心负责”。我们并不想给当今的统帅灌输怕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心理。相反，我们坚决主张，统帅应在这方面表现出勇气和随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精神，他们应当热爱自己的职责，对所负责任富有自豪的感觉，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树立某种偶像，或按毛奇的说法，迫使他们对这些偶像负责。他们只应当对政府和委任他们的人负责。

可见，在这位原奥地利总参谋长身上，作为一个统帅应具备的那种才智和性格的平衡还没有达到能与其所任高级职务相称的水平。

按照伯恩加基的理论，制定作战企图时理智应起主导作用，从这一点讲，康拉德是能力高强的，但他的思考中往往渗入了情感成分，在使这些企图付诸实施时，总参谋长那“容易激动的”头脑更往往使其失去常态——缺乏哈布斯堡一位统帅应有的坚韧精神，远远没有表现出小小军士为大将军们刻画的那种“风度”。

拿破仑说过：“我一刻不停地工作”。康拉德也有充分的权利这样说，因为他已把全副精力都投入了艰巨的工作。

如果我们费劲地去找证据，说明一位总参谋长必须具有很高的工作能力，那不啻是“故弄玄虚”。现代军事极端复杂，发展极快，要想跟上其前进步伐，必须加倍努力地工作。对于现代军队总参谋长来说，昼夜无一刻空闲之时，还常感时间不足，因为他的负担实在太重。不用说，这种负担与负担过重已无多大差别，进一步就会感到疲倦和出现神经衰弱的现象。因此，对于总参谋长来说，采取科学的方法安排各种活动，给自己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是十分重要的，必须保持自己的体力和精神，不能搞得精疲力竭。我们打算为总参谋长提供正常工作日的丹方，因为象这样的“高级”人士不仅应当有自己的作战“风格”，也应当有自己的工作“风格”。

我们无意干预总参谋长的个人生活，只想提一点，即他性格孤僻，不好与周围人接触……这种孤僻并非他一人所特有，鲁登道夫也承认自己个性孤僻，霞飞、法尔肯海恩及与康拉德同时代的其他一些统帅也属于性格内向的人，更不用说老毛奇和施利芬了。

当代领袖们性格上的孤僻，如果找不到顺理成章的理由加以解释的话，也许可以认为，这是逝去不久的时代的“军事大人物”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性。鲁登道夫曾公开宣布，他的孤僻是被周围他所“熟知其身价”的那些人逼出来的。勾心斗角、造谣中伤、拉帮结派——这就是不久前那些统帅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气氛。没有必要再提毛奇和

俾斯麦之间勾心斗角的往事，也不必再去描写世界大战前及大战过程中各国军队中盛行的倾轧，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我们赘述。“军事大人物”除了执行本身的职责之外，还得随时注意保护自己的地位，及时排除旁人的倾轧，了解觊觎其职位的人的健康状况，以便不失时机地扫除这种障碍，霞飞是这样行事的，双方堡垒中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也是这样干的。总而言之，平庸乏味的现实生活给当代的大“人物”打上了沉默寡言的烙印。

我们绝不是说，当代的统帅应当成为整天乐呵呵的小伙子，即常说的“心直口快”的人。不，一个统帅无论说话待人都应当有所克制，但又不能疏远别人，不要造成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到处常见的那种由于对左右不信任而产生的故作威严的紧张气氛。统帅的威严不能靠孤僻来维持，而是靠他超出于众人的内在品德……如今，脱离群众是树立不起威信来的，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开展工作，才能树立起威信。因此，对当代的军事领袖来说，孤僻是有害而无益的东西。

如果要求康拉德具备拿破仑所说的统帅所应具备的一切品德，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结论将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力图证明一点，即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无法找到作为某个个人的那种完整意义上的统帅，他的实质已变为一个“集体”在现代战争中，即使是曾经驰名于历史的三人执政制度也会感到无能为力的。